

女学 热点

在新发展格局中推动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两纲”的变与不变

·编者按·

近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新“两纲”的制定实施对于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同步推进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比《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概括与解读了新“两纲”在新时代新要求新期待之下的变与不变。

■ 赵媛 邵继尧 施斌

近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下简称“新‘两纲’”）。新“两纲”的制定实施对于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同步推进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比《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新“两纲”在五大方面继续坚持，即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没有变，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没有变，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工作重点没有变，妇女儿童发展的基本原则没有变，主要目标、策略实施、组织实施和监督评估的实施框架没有变；同时，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新期待，新“两纲”进一步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突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妇女儿童工作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对妇女儿童事业的全面领导得到全面加强。新“两纲”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妇女儿童工作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要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穿落实党中央关于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纲要组织实施、贯穿于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新“两纲”还注重对广大妇女儿童的思想政治引领，首次将“充分发挥妇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半边天’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列入指导思想，提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进妇女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引领妇女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提供更多有益于儿童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等新

目标新任务，为团结动员妇女积极投身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有力支撑。

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妇女儿童发展各领域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两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将高质量发展贯穿妇女儿童发展各方面各领域，对今后十年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一方面，新“两纲”在更高层次上促进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孕产妇死亡率、0—5岁儿童贫血率和生长迟滞率等指标要求继续下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妇女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等指标要求持续提升，“完善”“不断”等作为高频词反复出现，体现出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是一以贯之持续推进的；“小学生近视率降至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降至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降至70%以下”、“中小学生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达到60%以上”、“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2%以下”等一个个对原有目标的具体量化，凸显出“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大力培养女性科技人才”、“促进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规范化和有效运行”、“重视发展中国共产党女党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开通并有效运行全国统一的儿童保护热线”、“儿童事务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展开”等一个个新目标，注重引导支持妇女儿童发展主人翁精神，反映了新时代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创新特征和时代特征。

另一方面，新“两纲”以更有力的举措推动解决妇女儿童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增加了“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儿童的公共服务需求得到公平满足”的表述，在义务教育方面增加了“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表述，体现出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上一个地区都不能少；“困难妇女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重点向老年妇女、残疾妇女等群体倾斜”等新表述，体现出妇女儿童

事业高质量发展路上一个群体都不能少。

健全和完善各类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重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要求“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新“两纲”结合统筹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健全和完善近20个体系，由点到面、稳步推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让基本公共服务的阳光覆盖到每一名妇女和儿童。

一方面，新“两纲”提出要完善医疗保障、养老保险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让广大妇女受惠其中，对妇女社会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新“两纲”提出要健全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以及保障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为今后十年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提供了指南；同时，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新“两纲”提出要构建普惠托育服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支持、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体系，健全完善儿童健康服务、出生缺陷防治、教育评价、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以覆盖面更广、支持体系更完善、服务和效率更优、政策着眼点更准、延伸更深的方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家庭建设成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新领域

为更好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作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新“两纲”分别增设了“妇女与家庭建设”“儿童与家庭”两大领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两大领域与新“两纲”其他部分相关内容互相补充，为加强家庭文明建设，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坚实保障。

首先，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新

“两纲”指出要用好家风培养熏陶儿童，树立新时代家庭观，弘扬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家庭文明新风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其次，强化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保障。新“两纲”明确提出“建立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家庭政策体系，增强家庭功能，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并提出要基本形成“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同时在家庭关系、家务劳动、老人赡养、未成年子女抚养等方面设定了目标。第三，解决家庭教育面临的困惑与问题。新“两纲”明确提出要“发挥家庭立德树人第一所学校作用”，“尊重儿童主体地位”、“树立科学育儿理念”、“增强亲子互动”，同时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升家庭领域理论和实践研究水平”，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科学指导。

新增多措并举保障少年儿童安全

新“两纲”还增设了“儿童与安全”这一新领域，并将其放在儿童发展领域的第二位，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统计显示，伤害是导致我国少年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因此新“两纲”提出要减少儿童伤害所致死亡和残疾，逐步降低儿童伤害死亡率、溺水死亡率，减少儿童跌倒、跌落等伤害的发生，致残和死亡。儿童安全座椅、头盔等普遍推广应用；另一方面，近年来兴起的针对婴幼儿用品的“海淘”“代购”等，表明群众对食品、用品安全状况仍然抱有疑虑。新“两纲”指出要保障和提升儿童食品、用品安全，让少年儿童的衣食住行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此外，新“两纲”还强调要预防和制止对儿童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提高对学生欺凌的综合治理能力”、“预防和干预儿童沉迷网络，有效治理不良信息、泄露隐私等问题”、“儿童遭受意外和暴力伤害的监测报告系统进一步完善”等，全面呵护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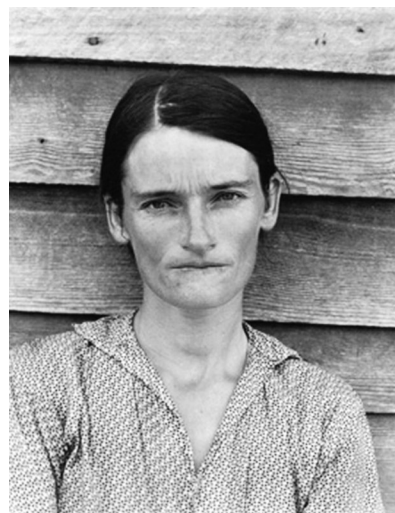
（赵媛为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女性性别研究培训基地主任，邵继尧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施斌为江苏省妇联干部学院院长）

主持人：李黎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艺苑 映像

「抄袭」有理？雪莉·莱文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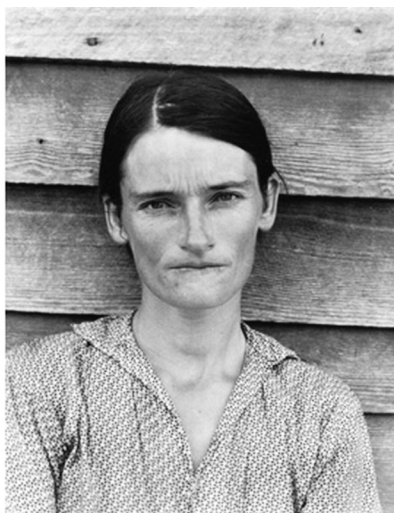
在当今艺术界，对图像的“挪用”已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挪用”作为一种艺术策略，可以追溯到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并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以及始于1950、1960年代的波普艺术，以及始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图片一代”，1990年代以来更是遍及所有文化领域。从最初将日常物品拼贴进作品中，到在名画印刷品上进行再创作、将现成品稍加改造或直接当作艺术品展出，再到从流行文化中“借用”形象，直至直接翻拍、复制他人的作品，“挪用”的概念变得日渐宽泛，与“抄袭”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不清，各类版权纠纷随之而来。新一代“抄袭”者认为自己是“当代考古学家”，怀疑论者则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寄生性文化。美国观念艺术家雪莉·莱文（Sherrie Levine，生于1947年）便是一位将“挪用”自身作为艺术主题的理直气壮的“抄袭”者。

莱文的大部分作品都明确取材于杜尚、蒙德里安、布朗库西、德加和罗德琴科等已故著名白人男性艺术家的现代主义作品，以挑战原创性和真实性等艺术批评概念，颠覆权威与性别权力，探讨消费主义和商品价值，以及艺术的社会来源和用途之间的关系。莱文早年接受过画家和版画家的培训，



并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她最初从事拼贴画创作，挪用美国历任总统的肖像及时尚杂志中的图像，其中《儿子与情人》（1976—1977年）系列被策展人兼评论家道格拉斯·克林普选中，参加了1977年在纽约艺术家空间举办的著名“图片”展。

1980年代初期，莱文扩展了她的挪用



策略，开始通过“再摄影”创作“观念昂贵的廉价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系列照片《仿沃克·埃文斯》（有人译为《沃克·埃文斯之后》），于1981年在她纽约地铁图片画廊举办的首次个展中展出。莱文直接从埃文斯的摄影展图中翻拍了22张黑白照片，那是埃文斯在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受美国农场安全管理局委托拍摄的照片，其中有一张阿拉

雪莉·莱文的《再摄影》（左为埃文斯的《仿沃克·埃文斯》），右为埃文斯的《阿拉巴马州的佃农》。

巴马州佃农妻子的肖像，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美国农村穷人的典型摄影记录。莱文未对图像进行任何处理便翻拍照片作为自己的作品展出，从而颠覆了摄影的记录性特征。这场展览既是一个“丑闻”同时又极为成功，作为女性主义对父权权威的劫持、对原创性与真实性的挑战、对艺术商品化的批判以及为现代主义死亡奏响的挽歌，这些作品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里程碑。埃文斯遗产管理机构认为该系列侵犯了版权，收购了莱文的作品以禁止其销售。莱文后将整个系列捐赠给了该机构，并于1994年随该机构的所有资产一起被移交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尽管莱文的创作被女性主义评论家解释为对艺术史经典的僵化建构的颠覆性干预，但她却更喜欢将之视为一种可再生的“合作”行为。几十年来，莱文把以男性为主导的艺术史上的许多杰作转化成了“有机且持续可再生的东西”。她不断推进艺术实践，从拼贴和复制扩展到了绘画、金属和玻璃铸造技术、印刷、造纸及装置等领域。在始于1985年的《结局》系列中，她强调嵌在每块木板上的人造“塞子”以隐藏其自然缺陷，那些以金色漆、白色漆、铅、亚克力色的“羊皮纸”等单色颜料“镶嵌”在胶合板上

的一个个孤立椭圆，引起了人们对它们的媒介的关注。而同期的条纹画、格子画和基于棋盘的几何图案系列，不仅指涉极简主义的泛滥，还挪用了不断重复的现代主义主题。在制作名为“泉”（又名《仿马塞尔·杜尚》，1991）的抛光铸造青铜小便池时，莱文挪用了曾被挪用的物品，在向杜尚那件著名现成品致敬的同时，通过提升其物质性和完成度，将之重新变成了“艺术品”。而在《仿埃贡·席勒》（1982/2001）系列中，莱文先是在1982年拍摄了这位表现主义画家疯狂、敏锐的个人自画像，后又于2001年用水彩复制了这些自画像。她还创作了费宁格、莫奈和梵高作品的复制品，并绘制了她自己在1980年、1982年和1983年的拼贴画。后来，莱文在计算机的帮助下进行艺术实践，将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品简化到了最基本的像素色彩摘要。

莱文将“挪用艺术”作为解决理论或社会问题的媒介，从而将有关这一概念的哲学思考推至极致。其可以无限复制并以不同形式展出的作品，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图像、物体、文化和艺术的传统思维模式。当“复制粘贴”“拖放”或“再混合”已成为当代人习以为常的操作方式时，莱文的艺术又显现出另一层深意。

专家视点

提高女性生殖健康水平策略措施中的伦理问题



·阅读提示·

2021年9月27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简称新“妇女纲要”），在提高女性生殖健康水平的策略措施中，新“妇女纲要”主要提出五点要求：其一，在学校开展性教育，让男女两性，尤其是女性掌握生殖健康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其二，增强男女两性性道德、性健康、性安全意识，倡导共担避孕责任。其三，将生殖健康服务融入妇女健康管理全过程，保障女性享有避孕节育知情自主选择权。其四，要求婚前孕前保健服务更加公平可及，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其五，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

2021年9月27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简称新“妇女纲要”），在提高女性生殖健康水平的策略措施中，新“妇女纲要”主要提出五点要求：其一，在学校开展性教育，让男女两性，尤其是女性掌握生殖健康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其二，增强男女两性性道德、性健康、性安全意识，倡导共担避孕责任。其三，将生殖健康服务融入妇女健康管理全过程，保障女性享有避孕节育知情自主选择权。其四，要求婚前孕前保健服务更加公平可及，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其五，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

从伦理学角度分析，这五方面的策略措施涉及五个重要的伦理问题：性教育与女性的自我保护能力、两性性道德和共担避孕责任、女性避孕节育知情的自主权、婚前孕前保健服务的公平可及性，以及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

性教育与女性的自我保护能力

1983年9月2日，康克清同志在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女性要“自尊、自重、自信、自强”，这是全国妇联第一次提出“四自”精神。1988年9月1日中国妇女六大报告将“四自”精神表述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1992年“四自”精神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自”精神依旧是指导中国女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获得独立解放的精神信念。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四自”精神亦可转化为一种女性维护自尊、自身权利、坚持自己独立人格，恪守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责任与自觉的能力。依据康德的理论，责任的责

在属性意味着一种承担，而在内属性便是一种自由自觉的能力。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女性要学习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疾病防控知识，有意识地保护自己。从科学认识、道德行为方面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与认知水平。生育不是私事，也非属于个体的小事，它不仅关乎母婴的健康，更关系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未来。社区和各个单位工会组织也应当定期组织讲座，把关心和促进女性的性与生殖健康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两性的性道德和共担避孕责任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两性关系是一种人类基本的道德关系，性道德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有些人看来，性、爱情和婚姻是一个私人领域，人们仅仅需要用理性、知识及情感来维系即可，不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然而事实上，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便有道德约束存在。婚姻是一种需要用法律和道德进行双重规约的社会制度，如果说道德是一种自律要求，法律便是他律和具有强制性的要求。当代社会的性道德包括许多内容，例如要尊重女性的独立人格和意愿，建立一种合乎伦理道德的、男女平等的和谐关系。两性关系须建立在合乎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这既是对双方幸福与健康关系的保障，又能在相互尊重平等关系中促进两性共同发展，保障所生育后代的安全和健康。另外，两性性共担避孕责任。生育是一个家庭和另外发展的计，尽管女性承担着生育行为，但生育责任却是两性、家庭和共同的责任，因而两性共担避孕责任也是对婚姻的一种基本道德要求。

女性避孕节育知情的自主权

尊重自主权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作出关于自己生命和身体的决定，例如在患病时应采取何种治疗方案等。自主性有两个要素：要求人们有能力思考行为计划，并有能力把计划付诸现实。尊重人的自主性意味着承认一个人的能力和观点，包括承认他/她持有某些看法的权利，承认他/她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作出某些选择的权利。这一原则也要求医生要对患者有适当的道德反应，认真听取和解答患者的问题，尊重患者的选择，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知情同意。知情同意由五个因素构成：胜任、透露、理解、自愿和同意。根据新“妇女纲要”要求，女性必须自己把握避孕节育知情自主权，在帮助女性采取避孕节育措施时，医生也必须做好知情同意工作，让女性充分地理解相关信息，以便能够自主地决定和自愿地行为，这便是保证女性避孕节育知情自主权的基本含义。

婚前孕前保健服务的可及性

婚前孕前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关乎生殖健康公共卫生服务的公正分配问题。在当代伦理学中，公正原则关系到社会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尽管学术界对于公正概念有许多阐释，但一般说来，“公平”“平等”等词语与公正同义的，几乎所有公正理论都有一个底线原则：平等应是被平等地对待，而不平等便是被不平等地对待。也就是说，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种族、阶级、性别和年龄等差异，但是他们不应当被不平等地对待。

伦理价值观、原则和标准方面的指导。2019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建立了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正是由于这些努力，中国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2019年，中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77.3岁，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到17.8/10万和5.6‰。从上述成就中可见，婚前孕前保健服务的可及性，目的是以公共卫生健康服务的公正分配来保障母婴健康。

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指的是人类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生育的技术。在这一技术造福于人类之时，也引发了许多伦理争论。例如人工授精主要是为了解决男性不育而产生的生殖技术。它采用人工的方法将精子注入女性体内，使之受孕和生育。人工授精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伴侣中的男方或者丈夫是精子的捐献者，其二是使用捐献者的精子，这便引起了人们对于精子道德地位的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辅助生殖技术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为了“优生”而四处寻求“超人”基因。鉴于这些伦理争议和人类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所面临的风险，各国都在以不同方式规范这一技术的应用。同时，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进步，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已经成为当代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研究可以直接为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提供价值指导。（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